

为什么我不能毫无保留地支持减负

徐轶青

2020.06.09

凌晨 2:30，终于把今天该做的事做完。几个小时前，读了黄斌老师的长文，酣畅淋漓，让我看到了许多之前没忽视的角度（下面争取提到）。但对他的主要结论，我是不能同意的。至少我无法像他那样“毫无保留地支持减负”。不吐不快，看今“晚”能写多少是多。次日补充，把我想说的基本说完了。

下面，我从本科前公立教育（从学龄前到高中毕业）的目标、制度约束、行为主体的激励与行为、政策工具、政策效果与均衡等五个角度来尝试分析这个问题。中间再穿插着回应黄老师的观点。

一、公立教育的目标

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公立教育的目标，是在以下两个目标做出权衡：

- 1) 最大化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
- 2) 最大化教育结果的公平

目标一、最大化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

社会人力资本最大化，既意味着为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过去 10 年可能是能干的富士康员工、未来 10 年可能是高级技工甚至是程序员），又意味着为尖端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储备和后备军。这两者之间有着权衡关系。

和所有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的社会福利问题一样，人力资本最大化面临加权问题。把更多的权重放在尖端的科研人员，还是放在蓝领技工，会得出非常不同的政策建议。

我们且把加权问题放在一边。最大化全社会人力资本，基本上意味着把更多教育资源，放到那些资质好又勤奋的孩子头上去。所以，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基础教育大致有两个：（1）选拔勤奋且天赋高的人，（2）培养人才。前者需要一个比较公平有效的考试体系。后者需要激励教师。

实证问题 1：未来 10-20 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最需要的劳动力需要什么样的技能？高级技术工和科研人员是不是并不很远？

猜测：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匹配的优质教育获得高回报。也就是说，为大众提供优质廉价的高中教育甚至大学教育在 10 年后可能将成为必须。

实证问题 2：尖端科技人才是冒出来，还是垒出来的？

猜测：天才在适宜环境下会冒出来，但是对大部分中高级科研、技术人员，我的观察是，他们的才能是垒出来。亚洲社会和德法等国家比较扎实的基础教育，提供了这个科研人员的蓄水池。

我们估且假设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以下这个函数刻画：

有效人力资本 = f(学生的天赋, 学生的努力程度, 家庭教育投入, 公立教育投入)

其中，家庭教育投入包括质与量，也包括课外实习的投入。公立教育投入同样包括质与量。上述四个变量之间有正的相互效应。

目标二、最大化全教育结果公平

教育结果公平的最大化，有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矫正财富和权力造成的不平等。但教育结果公平又是决难做到的。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当过老师的人都知道，有些人你是教不动的。如果单纯追求教育的结果公平，就意味着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

这里需要强调，公立教育和家庭教育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可能造成对贫穷家庭的歧视——农村或低收入家庭孩子并不笨，但是因为沒有好的早期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可能表现出“资质不佳”。这里，黄斌老师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

折中——能力指向的平等

那怎么办呢？我比较信服阿马蒂亚·森的看法——目的应该是“能力指向的平等”。

假设有一个无知之幕，我一生出来就被分配一个天赋指数（大多数人差别不大）。然后，我作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决定要不要努力，努力多少。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是这样的：一个天赋平均、甚至比较差的人，只要肯努力，就能被教育得掌握相当的技术，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

这意味着什么呢？一，就选拔而言，穷人的小孩如果聪明、努力，也有机会上学校甚至名校；二、就培养而言，穷人和富人的孩子有差不多的机会获得比较优质的基础教育。二帮助实现一。

北欧社会似乎比较接近森的理想——不管你的父母有多富有，只要你努力，过于衣食无忧的充实生活应该不太难。

教育结果公平 ← ... 能力指向的平等 ... → 人力资本积累最大化

可以把“能力指向的平等”比较粗浅地理解为，在人力资本领域福利保底后社会功效最大化。也就是说，只要一个肯学，即使天赋将差，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而对于天赋非常人，则上不封顶，尽可能给他们提供资源，为社会创造财富。

这种福利观介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功效主义和最大化最差者的罗尔斯主义之间。我的师兄丁建峰通过研究发现，相对于完全的功效主义和完全的罗尔斯主义，北大学生比较偏好这种有保底的功效主义。我猜测中国社会也是这样。

实证问题 3：能力指向的平等，更接近“教育结果公平”这个目标，还是更接近“人力资本积累最大化”这个目标？

猜测：这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种种人口、社会和制度参数。从激励角度讲（后面会谈到的），我觉得它更接近“社会人力资本最大化”。

注意，人力资本积累最大化，并不是让富人或城里人多受教育，而是剥离家庭环境因素后，让天赋高的人获得更好的教育。这个目标已经蕴含着用公立教育矫正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实际已经是非常“进步”（progressive）的福利观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讨论其他更容易实现的社会目标，比如最大化有钱人的孩子的人力资本。原因是，对社会整体而言，我认为这类目标并不是可欲的。

既然我们现在讨论目标，就要把在最完美的情况下希望实现的东西想清楚、讲清楚。然后才能讨论，什么样的更容易实现这样的目标。

二、公立教育的资源和制度约束

公立教育面临资源约束和制度约束。第一、钱和优质教育资源（师资）是有限的。第二、属地原则。大学前的教育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学决定了，富裕省份或地区的钱不容易流到贫穷省份或地区。钱流不动，教育人力资源的流动就更难了。

三、公立教育的行为主体和他们的激励

公立教育的行为主体主要有：学生和家、教师和学校。

我把学生和家绑在一起讨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利益动机是一致的。家可能短视，学生也会。这里隐藏着一个实证问题。在本科之前，学生是否比家更了解自己应该学多少、怎么学？我们这里暂不引申讨论“宝宝不高兴”的问题。

学生和家的激励：希望学生有好的前程。有好的前程，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下，是上一所比较好的国内外大学。

学生和家的行为：取决于家对教育回报的认识，认为教育回报高的，会将一大部分家资源投入到补充的人力资本积累当中去，包括上补习学校，甚至送出国。

教师的激励：教好学生获得的心理和货币收入 - 工作辛劳的负效用

教师的行为：在教好学生获得的回报和辛劳之间做权衡，选择努力程度

我对公立教育体系里的教师的观察有限，不敢枉加评论。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大部分有上进心优秀教师，都希望更上一层楼，要从农村到城里、从三四线城市到一二线城市去、从较差的学校去较好的优秀。这是人之常情。第二点，教师希望自身的努力得到认可。

学校的激励：教育局考核 + 财务实力 + 声誉

学校的行为：在教育局指挥棒的约束下，通过改变教师激励、生源结构、教育模式来最大化财务和声誉

学校的校长既有升迁激励（政治路线），也有职业激励（专业路线）。我的观察有限，只能推测。

实证问题 4：学校和教师在多大程度上对指标和激励做出反应？在没有货币激励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能够同样的努力？

猜测：我的猜测是，激励（尤其是货币激励）是用的。弱化激励，会伤害教师的积极性。

强激励也有害处。如果考核的目标是学生的成绩，教师的关注点就很可能只是学生的成绩，而不是他们身心全方面的发展。

四、公立教育的政策工具

公立教育的政策工具大致包括以下这些（欢迎各位补充）：

减负。减负喊了几十年，我的理解是：一、降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难度。二、弱化义务教育阶段的考核指标。

教育资源均衡化。指用行政手段把教育资源（钱和人）从更丰富的地方转移到不丰富的地方。

取消（中考前的）考试、就近入学。还包括减弱其他与学生能力有关的信号。

大学生教育扶贫。派遣有理想的大学毕业生赴贫困地区支教。

大学招生指标的地区性矫正与向低收入地区倾斜。一直做不到，是有原因的。

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补贴。我的同事（我大言不惭了）罗斯高教授认为，高中教育不仅应该免费，还应该向农村家庭进行补贴。

五、政策效果与均衡的实现

首先要指出，教育政策之所以难，就是因为社会认为，把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给购买力最强或权力最大的人，并不是最好的安排。既不能用市场解决，也不能用指令解决，因此，我们面临一个非常难的机制设计问题。分别考虑两种情况：

一、**教育资源完全由市场来配置。**美国中小学的私立教育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教育质量好不好？相比美国的公立教育，整体来看非常好。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互补性也比较强。

但是，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极难进入这类贵族学校。即使因为少数奖学金名额进了，也会觉得格格不入。结果，既不符合教育公平，也不并不符合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最大化。为什么呢？因为富有的父母并不一定生能聪明的小孩。阶级固化使教育仅仅成为阶层的信号。

应该允许私立教育存在，但是它不应该大学前教育的主体。由于居住区分割，教育行业不可避免的价格管制、穷人的信贷约束，教育券模式看起来也行不通（我愿意被实证证据说服）。

二、**“减负”并由抽签决定教育资源配置。**这是目前政策的主流。和黄斌老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减负既不利于实现社会人力积累最大化，也不利于教育结果公平。

就第一个目标而言，减负弱化了能力信号，不利于选拔；同样重要的是，减负可能会伤害教师的激励，不利于培养。

我们就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聪明、努力的穷孩子，是更容易通过考冒出来，还是通过各种特长比赛冒出来？

就第二个目标而言，减负的目标，实际是“低水平均衡”，是希望大家别那么努力地去学。对于那些对于教育回报预期比较低或教育预算约束非常紧的家庭而言，他们确实会选择理性地放弃或降低对孩子教育的进一步投入。

但是，对于那些对于教育回报预期很高的家庭而言，就算预算有限，也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孩子去补习。

为什么抽签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腐败，概率不是对所有都平等吗？抽签的概率确实可以做到平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家庭对于孩子前途的效用函数是极端风险规避的！抽签的结果，对一个孩子甚至家庭就是百分之百。

一个非常关心孩子教育的家庭，如果抽到一所差学校，家长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弥补的。而这种弥补措施，持续加剧所谓的教育的“内卷化”。我认为，全城送补习班，是减负的后

面，而不是减负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在减负政策发生根本变化前，我会持续在退休金账户购买中国的课外补习股**

实证问题 5：减负是降低还是增加社会流动性。

猜测：这取决于社会家庭资源、教育偏好和天赋分布等参数。在认为教育长期回报低、预算约束紧的这部分家庭内部，减负确实可能通过降低教育投入的方式，抹平天赋甚至家庭背景的差异。

但是，减负丝毫不会影响剩下的家庭投入教育的积极性，反而大大刺激之。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减负会加入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入，进而降低社会流动性。

支持减负政策的朋友会说，那么把学校质量抹平不就行了吗？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抹不平。学校质量有许多难以量化、但可以被家长捕捉的信号。即使不排名了，家长心里很清楚，哪所学校好，哪所学校差。第二、钱可以挪，但人动不起并不容易。第三、抹平学校质量，弱化考核指标，会弱化教师的激励。

一个政策出来，我们要考虑行为主体对政策的反应。下面，我引述我之前与明涛老师的讨论（在炸掉的号里）：

- 收入比较高的家庭，直接把小孩送国外了。天资好的，目标藤校牛剑；天赋不够的，拿钱来凑，去个公立（或者社区大学再转校），总是没问题的。算上高中阶段的投资，现在价码在 200 到 600 万元人民币之间，其实上不封顶。
- 收入一般但小孩天赋不错（或家长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走国内的升学通道。学区房、民办、补习班，是生活的常态。这部分家长经济和精神压力最大，包括许多一二线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他们其实并不赞成减负。
- 收入一般但小孩天赋一般（或家长并不认为教育很重要）的家庭，支持减负。这部分家庭可能在正态钟形曲线的中间，人数很多，声音很大。这是黄斌老师提到的一部分人。
- 有权力通道的，如果不属于第一类，很可能会支持减负。

- 不在一线城市（因而教育资源差）或收入较低，但小孩天资好，或家长极重视教育的家庭，一般不支持减负。他们是衡水中学教育模式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人数不少，但是话语权不大。
- 教育资源差、收入低，或没有观察到教育的长期高回报率的家庭，可能支持减负。这可能是黄斌老师关心的主要人群。但是在长期来看，减负对他们是不利的，因为他们最需要校内的教育投入。

三、如何弥合越来越大的城市内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要弥合越来越大的城市内差距，关键在于把社会教育资源重新导入公立教育体制内。要帮扶的是那些特别重视教育、孩子有天赋且努力的低收入家庭，让他们有上升通道。

我认为，除了类似考试的选拔机制，别无他法。政府不是要去管控、取消这些考试，而且让他们尽量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同时引导考试的内容。在这点上，我是坚定的“倒退派”。考试不一定是统考，但可以是多校联考，同时向所有人开放。

这里，我同意黄老师，家长确实应该评估，即使有这样的上升通道，是否应该让孩子去学奥数。反过来，我们这代人有多少是被奥数、新概念英语给毁了？我是怀疑的。

此外，发展职业教育，并不需要以目前这种“减负”为前提。学生和家长恰恰需要足够强的关于禀赋的信号，才能判断孩子适合做什么。发展职业教育的难点是提高质，而不是增加量。在职业教育范围内，要大大增负，而不是减负。

弥合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让城里慢下来，而是要让乡村跟上来。政府其实有许多工具可以用，包括更大规模的大学生、研究生支教，改变高考名额分配中的歧视性政策、十二年义务教育甚至补贴、更大规模的中央政策转移支付等等。

六、结论

不知不觉，写了五千多字。总结起来是两点。第一、教育政策是机制设计问题，不能不考虑行为主体对政策的反应。如果减负是目标是教育结果平等，我猜测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第二、为了改进平等，应该采取更直接的帮扶措施，降低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效率损失。